

论邓小平稳定周边的战略思想 与中国的亚太战略

曹 峻

内容提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睦邻外交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据国际形势与时代主题的变化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新特点,提出了稳定周边的战略思想。邓小平稳定周边的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睦邻友好、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中印两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双方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从容地发展关系;中日两国要永远友好下去,这是中国的长期国策;以“搁置主权,共同开发”解决领土争端,促进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以“一国两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维护地区和平。在邓小平稳定周边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积极推行成功的亚太战略,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外部环境。

关键词 稳定周边 战略思想 亚太战略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邻国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能否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遵循睦邻友好的原则,稳定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建立和维护和平友好的周边国际环境,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睦邻友好外交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据国际形势与时代主题的变化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提出了稳定周边的战略思想,并成功地进行了实践,从而对我国新时期睦邻友好的外交工作产生的积极影响,为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拙文就此作一探讨。

邓小平稳定周边的战略思想的科学内涵

1. 睦邻友好、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是我国现

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此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目标。进入80年代,邓小平又提出了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三大任务: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使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经济建设,逐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在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邓小平指出,我国的外交工作必须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国家的现代化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说:“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

件大事。”^①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要睦邻友好、争取和平的周边环境,因为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是亚洲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良好、和平的周边环境才有可能达到。因此,邓小平曾多次指出:“中国希望世界和平、地区和平,特别希望同亚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成为更好的朋友,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决策。”^②

2. 中印两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双方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印度是南亚的大国,也是我们的近邻。在 50 年代,中印关系一度十分友好,但 60 年代以后出现了曲折。邓小平一贯认为,印度与中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两国应当想办法建立正常的、友好的国家关系。首先,中印都是本地区重要的国家,两国关系的改善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是十分重要的。邓小平说:“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世界上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中印两国人口最多,加起来有十七亿,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我们两国又是近邻,不相互了解、不建立友谊是不行的。”^③其次,中印都是发展中的大国,应当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中印之间的南南合作可以为其他国家做出表率,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邓小平指出:“中印两国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要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亚太地区如果不算美国,就是日本、‘四小龙’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较发达,人口顶多两亿,即使把苏联的远东地区、美国的西部地区 and 加拿大包括进来,人口也只有三亿左右,而我们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有十八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④。第三,中印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双方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邓小平说:“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不难解决的。一九七九年我见你们的前外长时就讲过

‘一揽子解决’,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我们和好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我相信,我们之间最终是会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泛的前景。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⑤

3. 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从容地发展关系。

苏联是中国重要的邻国,中苏两国有着 4000 多公里边界线,邓小平是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见证人,他的对苏对俄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 80 年代以前,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继续主张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1982 年中国决定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以后,邓小平主张逐渐改善中苏关系,但提出必须首先解决中苏关系中存在的“三大障碍”问题,即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中蒙边境驻扎重兵以及武装占领阿富汗的问题。起初苏联以涉及第三国为借口,否定中苏关系中存在“三大障碍”,直到 1986 年 7 月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表海参崴讲话,实际承认“三大障碍”的存在并准备采取有力措施消除“三大障碍”,中苏关系的坚冰才被真正打破。1989 年 5 月,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中国,邓小平与他进行了最高级会晤。在会晤中,邓小平首先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接着,他回顾了中苏、中俄关系的历史,指出了苏联霸权主义和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的危害。最后,邓小平强调,中苏关系应该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方针,“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⑥。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邓小平一开始提出了冷静观察的方针,他说:“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⑦后来,他又提出了“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方针,认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

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③

4.中日两国要永远友好下去,这是中国的长期国策。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邓小平一再强调,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的基本政策,应该从长远的观点来考虑中日关系的发展。他多次表示:“中日关系有许多话可说,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这是中国的长期国策。”^④ 1984年3月25日,在会见日本首相时,邓小平说:“去年我们两国领导人在东京做出了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⑤

为了长远地发展中日关系,邓小平主张中日首先要加强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他对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说:“我相信阁下也会同意,我们双方关系发展得还不足,两国的民间经济技术合作还很薄弱。我们欢迎贵国的大中小企业加强同我们的合作。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对他们做一点工作,劝他们看得远一点。中国现在缺乏资金,有很多好的东西开发不出来。如果开发出来,可以更多地提供日本需要的东西。现在到中国来投资,对日本的将来最有利。”^⑥ 其次,邓小平主张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消除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各种消极因素。1987年5月5日在会见日本友好人士时,邓小平说:“如果说中日关系有点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是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我们只担心这么一点。中国人民也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绝大多数人是反对这种倾向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受害的不仅是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我们赞赏日本舆论界、政治界的许多人士对这种倾向持批评态度,持警惕态度。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

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⑦ 最后,邓小平主张“日本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要自强,不要自卑”。1989年11月在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邓小平指出,中日之间只有遵循这些原则,“友谊才是永恒的,合作才是永恒的”。他认为,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些人自大起来,结果导致了军国主义。现在日本又有一些人,看不起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着重蹈覆辙的可能,因此,“日本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一直遭人欺负,现在与日本相比在经济技术上也存在较大差距,但是中国不要自卑,“要自强”^⑧。

5.以“搁置主权,共同开发”解决领土争端,促进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地域辽阔,边界漫长,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和周边邻国确实存在着领土主权争议问题,对此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重,立足现实,提出解决中邻之间矛盾和纠纷的新思路。1984年初在会见美国客人时,邓小平表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⑨。例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沙群岛问题,都可以避开主权问题,共同开发。邓小平指出:“‘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

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①事实表明,邓小平主张采取“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办法解决领土主权的争议,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趋势所要求的,也符合中国和有关国家的根本利益。

6.以“一国两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维护地区和平。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如中英之间的香港问题,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等等。如何解决邓小平从世界和平和地区和平的利益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解决方案。1978年底,他在考虑台湾问题时讲到:“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后来他又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方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可取的。”^②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政府于1982年开始与英国谈判香港问题,并于1984年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从1997年起,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随后中国与葡萄牙就澳门问题也达成了协议,规定自1999年起澳门主权归还中国。中国保证香港、澳门两个地区的社会制度50年不变。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1999年12月20日,

澳门回归祖国,充分证明了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历史创造性。

邓小平稳定周边的战略思想推动

中国亚太战略的成功实践

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地区大国,但从地理位置、利益区域和综合国力等因素考虑,中国仍主要是一个亚太或者说是亚洲的区域性大国。因此,中国应以周边区域作为对外战略的重点区域而非整个世界。根据邓小平的论述,中国的亚太战略可以概括为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遵循睦邻友好的原则,稳定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建立和维护和平友好的周边国际环境。

中国的亚太战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中国强调睦邻友好,以和平方式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边界争端,使中国与周围邻国的关系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就提出:“我们特别重视发展同邻近国家的睦邻关系,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的安全和发展,而且影响到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今天,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既存在着迅速发展的前景,又存在着使人忧虑的多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和临近国家建立和保持稳定的良好关系,发展积极的友好合作,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③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动,中国更加强调睦邻友好的基本方针并加以实际贯彻。1990年12月,江泽民指出:“我们要继续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④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该报告还确认“现在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全方位的良好状态。”这种良好状态具体体现为:“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中朝之间的传统友谊继续巩固和加强。中韩建交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同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同新加坡、文莱建交,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取得全面发展。中越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我国同巴基斯

坦、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的传统友谊得到加强。中印关系显著改善和发展。我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新的关系,两国关系存在着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前景。我国同新独立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我国同少数几个国家存在的边界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谈判并获得了积极进展。在主权属我的南沙群岛问题上,我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并愿为南中国海地区的长期稳定与互利合作而努力。”^①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正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所总结的:“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同朝鲜保持了传统友谊,同韩国巩固了互利合作。同东盟的对话与合作不断深化,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中越关系得到加强,两国签署了陆地边界条约。我国同南亚、中亚各国以及蒙古的合作保持良好势头。”^②

其次,在经济上,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和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以实现本地地区的共同繁荣。

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一是全球化,二是经济区域化,或称地区经济一体化或区域性经济合作。1989年11月,亚太国家建立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1993年11月APEC召开第一届成员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92年2月,欧洲经济共同体12个成员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宣布建立欧洲联盟;同年12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形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虽然开展较早,但与欧洲和北美相比,亚洲国家在区域经济集团化方面无疑是落后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国家以沉痛的教训,这次危机使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倒退了10年,韩国经济也遭到了沉重打击。痛定思痛,亚洲国家逐渐意识到团结合作的必要性。1997年12月,东亚国家首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召开,决心团结合作,共渡难关。此后发表的中国与东盟、日本与东盟共同宣言都强调了要进一步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一贯重视并积极参与和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重视并积极参与和推动本地地区的经济合作。加强同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

针。”^③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方针是:按照“亚太经合组织方式”来进行,即充分尊重各成员的多样性,承认成员之间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及其带来的不同利益与需求;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求同存异、自主自愿的原则;实行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实践证明,“亚太经合组织方式”符合本地地区的实际,有利于各成员的不同权益和要求得到较好的平衡,有助于发挥各个成员的能力,促进共同发展。坚持这种方式,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加强合作的重要保证。

根据这一方针,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以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2000年9月,10加3领导人会议(东盟、中国、韩国、日本)在新加坡召开,中国总理朱镕基在会上首次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这将是一个包括中国和东盟国家约17亿人口在内的巨大的自由贸易区。朱镕基总理表示,中国和东盟国家建立起自由贸易关系,从长期来看是可取的。2001年2月27日,第一个落户中国的永久性国际会议——博鳌论坛在我国海南省博鳌召开,表明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同年11月,中国—东盟10加1领导人会议一致同意确定今后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并授权各国部长和高官尽快就此开始谈判。2002年1月1日,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过10年的准备,正式启动,象征着东南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里程碑。在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日本也开始对本地区的经济合作持更加积极的态度。同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先后访问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五国。在访问中,日本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计划在今后5—10年内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日本与东盟发展自由贸易区,无疑将促进双方贸易,推动亚洲地区经济集团化的进程。

第三,在安全上,中国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同时积极参与并推动亚太区域安全对话机制的建立。

中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可以称为积极防御战略。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方针,并把“积极防御”

和“消极防御”区分开来。他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主张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安全战略。1980年10月15日,在一次研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这一方针在性质上是防御的,在内容上是积极的。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防御,防御中又进攻。一旦有事,即以积极的作战行动,立足于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1991年在关于海湾战争的总部机关研讨会上,江泽民重申了邓小平的“积极防御”方针。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方针,对这个方针怎么理解?如果理解为就是守着我们的周边,这种理解是不完整的。在另一次军委会议上,他还说:现在继续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不仅是继承我军的传统,也符合现阶段我们的国情、军情,有利于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保持主动。

在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同时,中国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中国主张,相互尊重而不是恃强凌弱,相互合作而不是彼此对抗,协商一致而不是强加于人,应该成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方向和特征。中国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ARF)、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CICA)、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东北亚合作对话会(NEACD)、中美日三边学术研讨会等多边安全对话合作进程,主张通过这些政府和民间讨论安全问题的重要渠道,增进各国相互了解与信任,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②

东盟地区论坛是目前亚太地区惟一的泛地区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论坛。1993年7月,中国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并正式加入东盟地区论坛。中国主张“东盟地区论坛应继续以建立信任措施为核心,探索新的安全观念和安全方式,支持各方就预防性外交问题进行探讨,并主张应首先就亚太地区预防性外交的概念、定义、原则和范畴进行充分讨论,形成共识”^③。

上海合作组织,原名“上海五国”,是中国与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共同创立的多边地区安全组织,也是成功的实践新的合作安全观的典范。这种安全观与冷战思维不同,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主张通过平等协商对话,加强相互信任,追求共同安全,开创了冷战后地区安全合作的新模式。上海五国最初是从中国与俄、哈、吉、塔解决边界分歧和加强军事信任的需要发展起来的。1996年第一次五国峰会通过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年第二次五国峰会通过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此后,五国元首每年会晤一次,会晤的内容也从边界问题扩大到政治、经济、地区安全合作和世界形势等更为广泛的议题。2001年6月,五国元首齐聚上海,举行第六次会晤,决定将“上海五国”提升为上海合作组织,乌兹别克领导人参加峰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扩大为六国。2002年1月7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非例行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召开的首次外长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自身建设等各方关切的问题。会上,六国外长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联合声明》,决定成立地区反恐机构,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维护本地区各国的安全以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④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

②1988年4月11日《人民日报》。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281—282、19—20、291—292、320、353、53、230—231、49、87、87—88页。

⑯《邓小平与外国首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⑰参见《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146页。

⑱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

⑲《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⑳《江泽民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下),第583页。

㉑1993年4月2日《人民日报》。

㉒2000年3月17日《人民日报》。

㉓转引自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㉔②③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作者简介:曹峻,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扬州,225009

〔责任编辑:王 欣〕